

见字如面:书信日常与文学传统

在漫长的手写年代里,书信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为历史的宏大叙事提供了真正的血肉,书信背后是一个鲜活而普通的人。五卷本《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出版,在书信几乎绝迹的今天,有着怎样的价值?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苏州大学教授、该书编者季进展开对谈。

对
话

1

李黎:季老师您好!首先恭喜《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五卷本完成出版,这部罕见的作品问世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但我的情感反应,首先是向往、羡慕和敬仰,主要源自两点,一是兄弟,二是书信,都是当下和未来很长时间都非常稀缺的事物。兄弟这个概念,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会得到改观,但书信这件事可能是一去不返了。不知道您在学术研究之外,对这本书是什么样的情感?

季进:谢谢李黎,谢谢你的关心和肯定。从2014年8月接手这项工作,到今年终于完成了全部书信的整理和注释,五卷本的《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全部出齐。这些年各地同时推出这类大部头图书的情况,已经比较罕见了,真的特别感谢台前幕后共襄盛举的朋友们。确实,也许以后兄弟姐妹越来越多,但像夏志清、夏济安这样心相印的兄弟,大概不会多。白先勇说夏氏兄弟的书信集,堪比苏轼、苏辙的诗歌往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在电子化的时代,书信手札几乎已成绝响。对于夏氏兄弟来说,这些信札只是日常交流的方式,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公之于众,所以一路写来,“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充满了生命的温度。通过书信,我们仿佛重新进入了夏氏兄弟的世界,跟他们同呼吸,共悲欢,万千感慨,难以言表。那几年,每天从早到晚好像都跟夏氏兄弟在一起,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迫不及待地等待下一批书信的到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和体验。也是因为整理夏氏书信,我们又开始了夏氏兄弟的研究,还在编撰夏氏兄弟的学术年谱,因此,我对夏氏书信的感情,既有心理性,也有学术性的,两者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李黎:书信是个很特殊的文体,向内,可以看到作家博大深邃的内心,向外,可以看到时代的洪流,卡夫卡、契诃夫等都留下了大量书信。您觉得《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夏济安夏志清兄弟都是专事文学评论,和作家、诗人相比,他们的书信集有什么特有的风格?

季进:你说得很对,真正优秀的书信集,总是既能看到作家博大深邃的内心,也能折射时代的洪流,夏氏书信同样如此。我们在书信中,看到兄弟俩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话家常,论学术,谈感情,聊电影,甚至还有不少私密性的内容,这些内容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部生动的传记。这部书信集,当然不是传记,但是却具有了传记的基本元素,是一部传记式的书信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部传记来读。

1947年至1965年间,夏氏兄弟生活的点点滴滴串联起了个人化的小历史。在我们熟悉的大历史背后,总是会有无数这样的个人史,构成了大历史的丰富肌理。夏氏兄弟作为一介文人,相信文学的力量、人文的力量,更愿意远离时代大潮,做一个边缘人、普通人。1949年以后,他们本来以为能重新回到上海,回到父母的身边,但很快就

意识到,他们是回不去了。从此,兄弟俩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台北,开始了各自离散漂泊的人生。一个在台北,为台湾地区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一个在美国,开创了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传统,后来夏济安赴美,又书写了一段精彩的人生。对于时代来说,这是离散的个人史,呈现了知识分子不同选择之后的另一幅历史场景。这种传记式的个人史,应该是夏氏书信的特有风格。

2

李黎:因为是兄弟之间的书信往来,这部书信集里家书的成分应该是最高的。思念与牵挂是第一位,而关于日常生活的讲述占据了书信集的主体,书信中大量出现日常事务,而罕见抒情的文字。可以看到“房子”“跳舞”“饭店”“看看踢球”“薪水”“英文小说”“准备考试”“代购”等大量日常生活词汇。这让我有两点感受,一是他们兄弟甚至并不是展现牵挂思念,而是以现代邮政支撑的通信方式,营造一种生活在一起、不曾天各一方的氛围。二是这部书信集凭借着两位作者洞察事物的专业素养、对生活的热情,尤其是对大量普通人生活情境的还原,似乎可以纳入“日常中国”序列?

季进:对于兄弟俩而言,书信是一种联系方式,也是寄托方式,甚至就是存在方式和生活本身。三天两头给对方写信,闲聊工作生活,交流情感波折,讨论学术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有了频繁的通信,他们似乎很少表达思念之情,虽然天各一方,咫尺天涯,却始终共在,心心相印。书信中大量的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倒未必局限于“日常中国”。他们的地理空间从北平到上海,从香港到台北,从耶鲁到伯克利,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是相当国际化的。夏氏兄弟生活于动荡不安的时代,书信的背后正是东西方大的冷战格局,而且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是漂泊不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书信对时局的动荡或政治的话题,却很少讨论。夏济安对时局的关切,几乎看不到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呈现,到了后期,夏济安才开始较多地涉及社会政治的评论。这倒是能看出夏氏兄弟的志趣是一如既往的,对日常生活始终充满了热情,随时随地、乐此不疲地谈论京剧、文学、电影、女友、穿衣吃饭等话题。他们的经济并不宽裕,很多时候捉襟见肘,每个月两个人总是想方设法凑出一百美元接济上海家人。无论生活如何困顿,他们都认真地生活,那些无意中保留下来的日常生活的写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代读书人最真实的生活常态,最感人的人性情怀。其实这些也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生活的质地,是真正的生活本质,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看到大时代的印记,看到时代对个人命运的掌控。而书信中保留下来的关于欧美电影、影视明星、图书报刊、穿衣吃饭、啤酒小姐等纷繁杂乱的信息,也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当时全球文化的窗口,倒与现在流行的重返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有了一种对话的可能性。

3

李黎:这部书信集应当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了,您预计《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评价会有什么影响?

季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书信集非常丰富,几乎每一位大作家的全集中,都有书信卷,比如《沈从文文集》中《书信卷》多达8卷。即使没有全集很多作家都出过篇幅不等的书信集,这些年书信集的出版几乎成了热点。但是,像夏志清夏济安这样兄弟之间、持续不断的完整书信,好像没有看到。前不久我们刚刚在复旦大学组织了一次“夏氏书信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坊,海内外的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夏氏兄弟书信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已经很好地展现了夏氏兄弟书信研究的巨大空间。对我来说,夏氏兄弟书信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显然是一个富矿、一个宝库。比如我们都熟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河,独标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四大家,甚至影响了1990年代以后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可是,这部经典之作是如何写出来的呢?对具体作品

李黎:除了家书,“日记”也成

为这部书信集承载的一种功能。而透过这部书信集,我们更可以看到一种现代化进程贯穿在当时当地的生活、思想之中,其中很多事物和今天非常相像,比如刚提到的“代购”一词,最近几年大火。这种似曾相识足以串联起百年来的历史,而非割裂。我们今天阅读夏志清夏济安兄弟,无论是阅读他们的传记类文字,还是他们的作品,是否也应当放在一个中国的、“五四”的、现代化进程的语境中看待?

季进: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很高,要真正认识和评价夏氏兄弟的书信集,以及他们的学术著作,的确应该将其置于百年来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脉络中加以考量。一方面,夏氏兄弟这样的文人,既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与西方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息息相通,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与碰撞中,形成了他们的文学观、审美观和文化观,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是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之所以能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与他们独特的文学观、审美观与文化观是分不开的。他们所代表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显然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对夏氏兄弟学术的、思想的、生活的理解与评价,也离不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语境。比如说,书信中大量的关于夏济安情感生活的记录,只有把它放到现代中国情感谱系中才能说得清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人,胡适、吴宓、徐志摩、郭沫若等等,曾经演绎了无数精彩纷呈的情感故事。夏济安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他喜欢了一个又一个的女生却一无所获,在情感方面既自负又自卑,既有明确的渴望又隐隐畏惧,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似乎透露出这一代读书人在大时代的巨变中惶惶不安的心理症象,为现代中国的情感谱系研究增添了一个无比生动的个案。

4

李黎:这套书信集,编辑过程应当是从2014年开始,今年,全部出版,这其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往事?

季进:近八年的时间,实在不能算短。王德威说,这些书信无时无刻不将历史、情感、知识,无论是雄浑的家国感触,或者微妙的黑暗面向,都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生命的书写。某种意义上,书信集的整理与编注工作,也是一种生命的书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生命体验。我特别感谢夏师母王洞女士和王德威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加入到书信整理的工作中,通过书信走进夏氏兄弟的心灵世界,重新认识两位夏先生。我也特别感谢曾经参与此项工作的学生的默默奉献。这期间有太多难忘的经历,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最初辨认手稿就非常痛苦,尤其是夏志清的中英文字体都比较特别,又写得很小,有的字迹已经模糊,往往很难辨识,有时为了辨识某个字、某个人名、某个英文,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才会豁然开朗。做注释时也是这样,为了注出某个人名、某个篇名,有时也不得不上天入地找资料,一天下来,只能完成几个注释,充分感受到了考证的艰辛。但是,现在感受最深的还是功德圆满的喜悦吧,一方面通过书信的整理与注释,对夏氏兄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也展开了更多的研究计划;另一方面终于大功告成,希望能给普通读者奉上一部传记式的书信,也能给学界带来更多的研究话题。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游群星闪耀时》。

VS



季进

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著作有《钱钟书与现代西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陈铨:异邦的借镜》《另一种声音》《彼此的视界》等。编注有《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五卷本)。主编有“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丛书”等。

的评价是如何形成的呢?书信集几乎为我们还原了《小说史》的生产过程。

夏志清当年一无依傍,完全靠自己穷尽式地搜罗阅读各种可能借到的作品,以一己的审美判断,建构了一个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其意义与贡献可谓巨大。现在经常有人批评《小说史》史料方面的问题,如果看看书信,就知道当年他的研究是何其艰难,远非今年所能想象。也许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同情之理解。再比如我们都知道夏志清的审美标准更多的是西方式的审美标准,这得益于他所受到的西方文学的系统训练。书信中大量记载了他与布鲁克斯、兰色姆、燕卜苏等理论大家的交往,还有他海量阅读的西方文学经典,以这样的学术训练,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写出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然就不平凡,因为他的评价标准是西方文学的大经大典,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来加以评析的。

这些书信,为我们重新讨论《中国现代小说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夏氏兄弟大量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以书信的方式承载和展开的讨论,其实显示了一种中国式的文学批评样态,借着私人絮语,表达出种种词意丰蔚的意见。时过境迁,现在这些个人化的甚至私密性的批评鉴赏,有机会公之于众,由有限的交流,扩展为与历史、与时代更广阔的对话,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重建历史的情境、生命的境况,也可以帮助我们由书信集入手,打开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更大空间。

4

李黎:这套书信集,编辑过程应当是从2014年开始,今年,全部出版,这其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往事?

季进:近八年的时间,实在不能算短。王德威说,这些书信无时无刻不将历史、情感、知识,无论是雄浑的家国感触,或者微妙的黑暗面向,都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生命的书写。某种意义上,书信集的整理与编注工作,也是一种生命的书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生命体验。我特别感谢夏师母王洞女士和王德威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加入到书信整理的工作中,通过书信走进夏氏兄弟的心灵世界,重新认识两位夏先生。我也特别感谢曾经参与此项工作的学生的默默奉献。这期间有太多难忘的经历,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最初辨认手稿就非常痛苦,尤其是夏志清的中英文字体都比较特别,又写得很小,有的字迹已经模糊,往往很难辨识,有时为了辨识某个字、某个人名、某个英文,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才会豁然开朗。做注释时也是这样,为了注出某个人名、某个篇名,有时也不得不上天入地找资料,一天下来,只能完成几个注释,充分感受到了考证的艰辛。但是,现在感受最深的还是功德圆满的喜悦吧,一方面通过书信的整理与注释,对夏氏兄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也展开了更多的研究计划;另一方面终于大功告成,希望能给普通读者奉上一部传记式的书信,也能给学界带来更多的研究话题。